



2005年湖南省岳阳市发现的为南京明城墙烧砖的窑址

南京明城墙城砖窑址调查

◎ 沈承宁

明代南京城的修建,工程巨大且持续时间较长,其过程也较复杂。由于现存的文献材料过于简单、笼统,许多相关问题的研究得不到解决,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分别对安徽和江西两地有关采石场及烧制城砖遗址进行勘测与调研,取得了第一手资料。

一、安徽新港、新淮两地调研的过程与收获

据安徽繁昌地方志记载:安徽省繁昌县位于亚热带的黄棕壤与中亚热带的红壤地带性土壤接壤地区,

与非地带性土壤覆域交错,土壤种类较多。全县大致可归纳为六种土类:棕红壤土类、黄棕壤土类(俗称黄泥土)、石灰土土类、紫色土土类、潮土土类、水稻土土类。其中水稻土土类分布于圩区洼地及丘陵、河谷低洼处^①。



成土母质为湖泊沉积物。土型冷,质地粘重,泥脚深,尤适合制造砖、瓦。

全县境内丘陵、山地、小坡较多。县西、北两面滨临长江,境内湖塘棋布,水网交织。主要河流有漳河、峨溪河、小江、黄浒河等。还有大龙窝、虬塘湖等重要地表水系^②。其中漳河等河流是构成通往长江的主要水上运输通道。

(一)明代城砖窑址

新港镇窑址位于新港镇的东北侧,从新港镇砖瓦厂起至官山的长江岸边坡地或丘陵处,均是明代砖窑遗址,全长约250米。砖窑皆建造在江岸的小坡地上,排列有序,两窑之间相隔15米。其中沿江一排窑址呈直线排列,其余顺山势走向排列。因现有镇、县两个砖窑厂长期在此经营,古窑址遭到破坏,目前尚存约二十多座。



2009年江西分宜发现的为南京明城墙烧砖的窑址

砖窑结构:所有的砖窑都是地穴式馒头形,窑床窑壁略经修整,经焙烧已成为红烧土的结层。残高3~5米,宽3米^③。窑室堆积:下层少量的木炭灰,其上皆是残砖和土,偶有次品的成型砖。

新淮乡窑址位于新淮乡董仓村的村头通往南陵县的淮宁路路基东侧,滨临漳河的西岸,窑址顺漳河堤岸排列有序。两窑之间相隔3.5米。由于淮宁公路基本是沿着漳河走向所筑,故此地古窑址遭到破坏,目前仅发现3座,其中一座窑口保存较好。

砖窑结构:砖窑外观呈地穴式馒头形,窑床、窑壁,

经焙烧后已成为桔红色烧土的结层。保留较完好的一座砖窑窑口为:底宽1.6米,残宽1.97米,残高1.96米,壁厚0.16米。

窑室堆积:除去窑口表面浮土后,窑内城砖四层交错叠压清晰可见,城砖交错空隙处,被黄粘土和碎石所塞。在窑室的底部,还发现了经久烧结为青灰色砖质的窑基。

(二)明代窑址的城砖

新港镇窑址的城砖。质地:目前所知有粘土砖、沙土砖两种,呈青灰色与清黑色两色。形状:为长方形,长40厘米,宽20厘米,厚11.5厘米,重16公斤。铭文:城砖横面正反皆有直书阳文铭文。其中一块城砖正面铭文两行:太平府提调官照磨钱仁 司吏施祥 繁昌县提调官主簿刘权 司吏何泽。反面铭文三行:总甲程德祖 甲首姚文信 小甲王宗六 窑匠林德春 烧砖人夫李思聪。

新淮乡窑址的城砖。质地:目前所知仅有粘土砖,呈青灰色。形状:与新港镇的城砖一致。铭文为直书阳文,因破损严重,无完整城砖铭文可考。

通过前后两次分别对繁昌县新港镇和新淮乡两地烧制建造南京城墙砖遗址的实地调查,加上调阅大量地方志资料,收获不少。此地有烧砖传统。在1982年至1985年的文物普查中,该县发现古遗址五十余处、古陶瓷窑址九处、古城址四处、古建四处等。汉置春谷县,故治在今县西北。东晋改为繁昌,据《帝王世纪》载“魏文帝登禅于曲之繁阳亭,为县曰繁昌。”是繁昌因繁昌亭而得名。故城在今河南临颖县西北三十里,东晋始侨置今繁昌县地,仍沿繁昌之名。至明洪武年间,繁昌人口达“三千七百一十七户,一万五千八百六十丁”。^④明初全县划分为五乡,辖三十六都。

繁昌地区制瓷造瓦行业历史悠久,窑匠的技术水平很高。建于北宋时期宣州瓷窑遗址曾兴盛整个宋代,其中以柯冲窑著称于世。几乎遍布繁昌地区的制砖业,从明洪武年间开始见诸当地志书,到了民国时期,全县有大小砖瓦窑三十二座,每年“惊蛰”开坯,“大雪”停窑。目前,全县二十个乡镇中,有十六个乡镇设有砖瓦厂。

首轮《繁昌县志》载:“明代,小淮、旧县等地有砖瓦窑20多座,洪武年间,太平府差官监制,所产砖瓦运

首轮《繁昌县志》载:“明代,小淮、旧县等地有砖瓦窑20多座,洪武年间,太平府差官监制,所产砖瓦运

往南京建造宫殿、城郭”^⑤，“自然镇小淮窑，历史上所产砖瓦远近闻名，因地处芜湖、南陵、繁昌三县交界处，交通偏僻，昔称“三不管”地界。”^⑥

明代编修的《重修太平府志》载：“繁昌县每年将概（该）县人户编派荻港镇江夫三百十四名，共编银一千零二两，又于宁国府拨夫二百六十六名，共银八百两帮助专一答应使客。”^⑦

两窑址及窑址内出土城砖与南京城墙砖比较：从新港、新淮两地窑址出土的城砖质地来看，新港窑内有粘土砖和沙土砖两种，而新淮窑目前仅发现粘土砖。这与新港窑临近江边、土质含沙较重有一定的关系。新淮窑内出现“宁国府”字样的城砖，是出乎预料的。根据史料记载，明初的繁昌县隶属太平府，而新淮当时为繁昌县的一个乡。在太平府繁昌县的境内怎么会出现“宁国府”字样的砖？这种现象以前从未见记载。笔者认为，这里历史上属于“三不管”地界^⑧，砖窑窑址的漳河对岸即为明初的宁国府南陵县地界，明初两地曾多有交往^⑨，它为我们提供了当地志书上未曾记载的史实：即明初宁国府向太平府“拨夫”，而太平府为宁国府烧制过部分城砖，两地官府之间对朝廷“征派”等事亦有过互通现象。因此，在太平府繁昌县的小淮窑遗址中发现“宁国府”的城墙砖，是可以理解的。

窑址内城砖与南京城墙砖比较：在新港镇荷圩村附近的实地调查中，我们从一座砖窑遗址中挖出一块带有铭文的残砖，铭文为：“……照磨钱仁司吏施祥……提调官主簿刘权司吏何泽。”而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馆藏的太平府繁昌县标本城砖的铭文是：“太平府提调官照磨钱仁司吏施祥繁昌县提调官主簿刘权司吏何泽。”这两块城砖的质地、大小不仅相同，而且府、县两级提调官的职务、姓名完全吻合。由此可知繁昌县新港地区荷圩村附近的地穴式馒头形砖窑群确系明洪武年间为南京城墙烧制城砖的砖窑原址。

据清道光六年（1826）编纂的《繁昌县志》所引用的旧县志中得知铭文中“繁昌县提调官主簿刘权”这位主持烧造城砖官吏的一些情况：刘权的父亲刘赓原任

宛平县主簿，洪武初年受命“制砖窑于繁邑。赓营基度地于陈冲埠、回龙矶，赓亡，复命子权袭其职……”刘氏父子在繁昌主持为建造南京城墙烧制城砖的数年中，恪尽职守，体恤民情，受到当地民众的爱戴，“父子继美，曲体民情，地脉坟茔，必加保护。工既竣，即以陈冲等处田土赐权及子孙”。因此，我们在新港明代砖窑窑址布局上，仍可看出当年刘氏父子的独到匠心——即便利用城砖的运输，又不破坏当地的“地脉坟茔”。到了明弘治八年（1495），朝廷停止“烧造官员”后，繁



烧制明城砖窑址

昌县百姓请求刘氏后人留在繁昌，“合邑高其义，请刘隶籍于繁”^⑩。这是南京城墙数亿块城砖中，第一次通过实地调查（当地砖窑遗留的城砖）并结合相关资料（南京城墙城砖铭文拓片及史料）所揭示的较为详实的地方官吏负责烧造南京城墙城砖的情况。其中地方志所记载的史料对调研和研究的深入展开起到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江西宜春、新余两地明代砖窑调查过程及收获

南京明城垣史博物馆在获悉江西省万载县存有明城砖窑址后，于2007年11月初组队赴江西实地考察。先后对江西宜春市所属万载县和袁州区彬江镇以及新余市所属分宜县分宜镇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在万载县虽未发现明代城砖窑址，却在彬江镇及分宜镇两地首次发现了较大规模的明代砖窑遗址群（在分宜



发现的古窑址烧制城砖为白色)。

江西省宜春、新余两地现属地级市。宜春市境内以丘陵、山地为主,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素有“山明水秀,土沃泉甘,其气如春,四时咸宜”之称。国家重点保护的唐代六大名窑之一“洪州窑”在其境内,烧制瓷器和砖瓦的工艺历史悠久。境内的袁河、龙江两大河流直入赣江,水路航程千余公里。新余市位于袁河中游,东临樟树市、新干县,西接宜春市袁州区,南毗吉安市青原区、安福县、峡江县,北连上高县、高安市。

明代宜春隶属袁州府,新喻(余)隶属临江府。袁州府领四县:宜春、萍乡、万载、分宜;临江府领四县:新喻、新淦、峡江、清江。明初建造南京都城墙时,曾向直隶、江西行省和湖广行省各府州县征派烧制城砖任务,^①在上述八县中,除峡江县外,其他七县在南京城墙砖文上均有发现。

(一)当地明城砖窑址的文献记载

根据宜春市和分宜县两地地方志办公室同志介绍,关于明初当地为南京烧制城砖未见当地文献记载,也无明初砖窑遗址的发现报道。而江西宜春地区发现有关明代城砖的信息,近年来却屡见报刊。

1986年6月中旬,在江西省万载县城康乐镇南门的基建工地上,清理出明代洪武十年(1377)的白瓷砖四块、清灰砖三块。“……今天出土的白瓷砖,青灰砖是当年为筑南京城墙所烧制的多余品或残次品。”^②

2003年7月14日,在江西省宜春市城区距袁州古城墙墙址不远的一处基建工地的断垣残壁中,发现一批明洪武十年元州府烧制的城砖,这批城砖是用白泥烧造的,略呈黄白色,砌在民房的墙中,所以尚有部分保存完好。^③

2007年春,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文物管理所在征集民俗文物时,意外征集到两块完好的明城砖。该砖由当地农民汪德中于2001年在主簿镇废弃老屋的房基下所得,一直珍藏在家中。“两块砖通体呈黄白色,由白灰泥烧制,质地坚硬,敲之有金属音。两砖规格均为长40厘米、宽20厘米、高11厘米。一块侧面刻内框,框内自右至左竖刻三行字,右刻‘袁州府宜春县提调官主簿高亨司吏陈廷玉’;中刻‘烧砖人彭暑人户周普□’;左刻‘洪武十年 月 日’”。当地文管所的同志查阅《岳西县志》,此地并无建城烧砖的记录。历史上岳西境内建过一些山寨类的防御工事,不可能从宜春调运官窑的城砖。因此,他们根据《岳西县志》对“主簿镇”名字的来由的所载“明朝此地曾出主簿官,故取

名主簿”,进而初步推论砖文所刻“提调官主簿高亨”是当地主簿镇人,可能千里迢迢带两块城砖回乡纪念。^④

明初袁州府城砖窑址史上并无明确记载,此次考察小组在宜春的《宜春市彬江镇志》(未刊稿)中,才首次发现有关明南京城砖窑址的记载:宜春市袁州区“彬江镇东偏北三公里小山坡上,居曾、宋二氏。四十六户,二百八十二人。村后袁河边上明洪武年间南京城墙砖窑遗址”。^⑤正是靠了这段文字,在当地镇、村干部帮助下,终于发现当年袁州府属下的砖窑遗址。

(二)宜春、分宜两地明城砖窑址的现状

据宜春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袁赣湘先生回忆,当年他下放在彬江镇时,曾听当地老人说过:洪武年间沿袁江一线设有砖窑,长达数公里,砖窑遗址的范围,大致从今天的彬河镇顺河而下,直到分宜境内都有砖窑的遗址,只是这项工作从没有开展并得到确认。考察小组根据这条重要线索,在当地地方志办和文化局领导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彬江镇和新余市分宜县分宜镇进行实地考察。

在宜春市袁州区彬江镇宋家村,我们听到了类似袁主任所讲述的口碑资料:“明代这里曾有几万人在这里烧砖,挑灯夜战。从河边一路过来,窑址有几公里长。明洪武之后,这里除了为南京烧砖之外,还为南昌府、袁州府烧造过城砖。”当地村民对朱元璋在南京造城并不陌生,几乎都能脱口而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句子。当地村民宋国华还称:他在袁江岸边捕鱼时,因避雨常会钻进设在岸边的“馒头窑”里。在宋国华的带领下,我们在距村后不远处一片临河的坡地上,发现了一组残缺程度不一的窑址群,窑址大都被荆棘和杂草藤蔓遮掩。这组窑址群,建造在袁河北岸坡地,呈三层不均匀分布在阶地上顺坡而置,初步查勘有八座,因就地掘土成窑,窑形呈圆锥状,故称“馒头窑”,对其中一座砖窑遗址内腔(无回填土,仅腔底有浮土)进行了初步勘测:窑腔内壁土质呈红色,窑内腔长2.82米,腔深1.77米,现状腔高2米(未掘至腔底)。腔内设有烟道3条,暴露的烟道宽0.2米,深0.35米,高约0.8米,在暴露的烟道上部有条直径约为0.1米的暗烟道直通窑顶。在距窑壁外侧2.4米处,发现设有火道一个。

考察小组来到分宜镇岭背村,经向当地64岁的村民卢犬明咨询后得知:附近地名是朱氏棚“窑背上”,这一带世代以置窑烧砖为业。老人说这一带有一百多座古窑址。在他带路下,考察小组在袁河边发现了一组散布在坡地边的砖窑群。该砖窑群整体情形大体与

彬江镇宋家村的窑址群相似,此地与宜春袁州区彬江镇宋家村同在袁河北岸,相距约三公里。

考察小组考察了其中一口砖窑。此窑腔内壁土质呈红色,窑壁厚0.6米,窑腔内宽3米深2.6米,内设烟道3个。显露的烟道宽0.33米,残高0.45米,在烟道上部各设有暗烟道,直径约为0.1米,直通窑顶。在一小山坡上另一口残损的窑址,窑壁厚0.22米,宽2.5米,高2.2米。窑内淤塞的填土与窑壁外的土质色泽有明显区别。在残窑回填土中,还发现了多块残缺不等的白色碎砖,根据残留的文字,知与南京明城墙的城砖基本一致。

(三)江西明代袁州府城砖窑址考察的收获

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赴江西明代砖窑考察小组在宜春和分宜两地同一条河道沿岸坡地发现的砖窑群,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为南京城墙烧制城砖的明代窑址。^⑩此次调研结果填补了南京城墙研究工作中有关江西袁州府“白瓷砖”烧造窑址方面的空白,弥补了当地县志记载的空白,印证了明洪武年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征派民夫烧制南京城砖的史实。

通过比对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收集的明代袁州府宜春县及分宜县城墙砖,可以确定这是一组为南京城墙烧制的官搭民烧的窑址群。^⑪在江西宜春市袁州区彬江镇宋家村窑址附近征集到的城砖铭文为:“袁州府提调官通判□□司吏任俊宜春县提调官主簿□□□司吏陈廷玉 总甲□志甲首杨右贵小甲易贵环窑匠易□一造砖人夫王谷保。”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馆藏城砖铭文为:“袁州府提调官通判陶赞司吏任俊宜春县提调官主簿高亨司吏陈廷玉 总甲袁渊正甲首彭隆小甲易和仲窑匠杨信造砖人夫易英。”在当地所见及征集到的其他残砖铭文,与南京城墙砖文比对,明确显示两地城砖属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烧制,其烧制目的是为朝廷营造南京都城城墙提供砖料。^⑫明代袁州府宜春及分宜县两地城砖官搭民烧窑址群的发现,对了解和认识明初南京城砖窑址的规模有重要参考价值。洪武三年(1370)至洪武十七年间,是南京城墙(主要是京城)工程最为繁重的时期,长江中下游水系所涉的各府州县出现了大规模烧制官砖的高潮。这批官搭民烧窑址群临近可通长江的水道而设,就地取土制坯装窑烧砖,官窑的规格并不高,但数量众多,适应了当时建造明都南京城墙的需求。

这一地区的明代砖窑遗址的发现,不仅揭示了明初长江中下游地区征派民夫烧造南京城墙砖的史实,还填补了以往对赣西地区南京明城砖中“白瓷砖”的烧造规模、烧造技术及明城砖沿江水系运输等诸多文献记载上的阙失,古窑址群已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当地的地方志也对古窑址的现状 & 保护情况做了详细的记录。

南京城墙文化遗产不仅属于南京,也属于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在“明清城墙”组合申遗的新形势下,南京城墙要走出单一城市性的保护,拓展为长江中下游区域性大遗址城墙文化保护,为“申遗”成功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 ①繁昌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繁昌县志》第5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 ②同上书,第60页。
- ③繁昌县博物馆编制:《安徽省繁昌县文物普查登记表》(未发表)。
- ④(清)曹德赞(原本)(清)张星煥(增修)《道光繁昌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四十一册第7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
- ⑤繁昌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繁昌县志》第23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 ⑥同上书,第47页。
- ⑦明·林钺修,邹壁纂:《重修太平府志》,载于《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二十二册,第868页,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
- ⑧繁昌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繁昌县志》第23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 ⑨参见上书第47页。
- ⑩《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工部十。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8月版。
- ⑪杨国庆:《南京明代城墙》第145—155页,南京出版社2002年1月版。
- ⑫《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2期。
- ⑬《宜春早报》2003年7月15日。
- ⑭《合肥晚报》,2007年6月1日。
- ⑮宜春市袁州区彬江镇镇政府提供。
- ⑯参考杨国庆、夏维中:《关于明代南京城墙砖文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古城墙保护研究》第64页。文物出版社。
- ⑰特指由官府督办、民夫烧造,最后成器(包括城砖)全部由官府调用。
- ⑱《大明会典》卷一九〇《工部·物料》。

